



美国汉学家罗慕士： 推动中华经典走进西方世界



汉学家罗慕士

罗慕士(Moss Roberts, 1937-),是美国汉学家、翻译家,汉学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哲学、古典文学等领域,翻译出版了《论语》《三国演义》等中华经典,曾任纽约大学汉学系教授,讲授中国文化课程。多年来,罗慕士在教学与翻译、翻译与研究、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之间不断切换角色,解码中华经典蕴含的文化基因,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和传播。

李震

潜心解读《论语》,传播儒家思想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美国先后对外发动了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,引起美国国内民众强烈不满,更引发国民的信仰危机。罗慕士亦不例外,在信仰危机中将目光投向中国,希冀从中获取精神滋养,并纠正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和误解。

从本科阶段结缘人文亚洲课程,到博士阶段专攻中文,罗慕士对中国之爱愈加浓烈,并于1966年顺利完成博士论文《孔子〈论语〉中形而上学的语境》,开启了其系统研究中华经典之路。罗慕士认为孔子用平易近人、朴实无华的语句即“仁”和“道”,表达着自己的哲学思考,堪比同时期的西方哲人苏格拉底。

随后,他又发表《〈论语〉中的礼、义、仁:三大哲学定义》一文,通过与另外两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、荀子的比较,详细论述孔子的思想内核。罗慕士认为,孔子主张的“和”具有“和平”之意,奠定了中国人爱好和平、睦邻友好的品格基因,与好战的美国形成强烈对比。迥异于柏拉图的高篇大论,孔子用言简意赅之语,为普通民众指明了为人处世之法,亦为统治阶层提供了治国安邦之道。

出于对孔子的热爱,80多岁高龄的罗慕士仍然笔耕不辍,于2020年推出了《论语:孔子的论断与对话》一书。在罗慕士看来,孔子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发展两千多年,更形塑了日本、韩国、越南等东亚国家的文化基因。孔子超越了时间,跨越了空间,不仅属于中国、东亚,更属于当代世界。因而,罗慕士直言,“孔子是我们的老师”。

三次翻译《三国演义》,铸就最佳英译本

除却孔子,罗慕士还钟爱《三国演义》,认为这部作品凝结的中国文化意蕴丰富,“远超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等其他古典文学作品”。他先后三次翻译《三国演义》,不断扩大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。

作为大学老师的罗慕士,自然会将其钟情的《三国演义》带到文学课堂之中。他挑选了其中的46回进行翻译,并于1976年推出了节译本《三国:中国的史诗

剧》。他认为《三国演义》中独缺“爱情”,所以用romance来对译“演义”并不能反映出这部小说的文体特征和主要内容,反而会适得其反,让西方读者产生误解。在罗慕士看来,《三国演义》既有“荷马史诗”中的史事、冲突,又有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厚重感、韵律美,故而他创造性地同时使用epic(史诗)和drama(戏剧)来对译“演义”,以彰显这部作品的独特性,让《三国演义》得以快速地连通世界文学。

节译本的成功出版,让罗慕士在西方汉学界的名声逐渐响亮起来。1982年,在外文出版社总编辑罗良先生的建议下,他决定开启《三国演义》整本书的翻译工作,并于1983年-1984年在中国生活两年,以便全身心地查阅资料、进行翻译。为了尽可能地实现原文准确阐释,罗慕士以毛宗岗评本《三国演义》为底本进行翻译,同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研读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,比照其他三国话本特别是嘉靖本,让全译本充满浓郁的学术味。该译本最终于1991年出版,不仅附有近80页的跋语,详细阐述《三国演义》成书过程、素材来源、人物形象以及不同版本等多种学术问题,更是配有26条三国时期大事年表、11幅地图、115位主要人物列表、12幅主要人物绣像图、35幅情节插图,以及1184条注释。美籍华裔翻译家余国藩认为罗慕士的译文“超级优美,富有学术性”,著名汉学家韩南亦认为“罗慕士英译的《三国演义》,生动流畅,忠实于原著,实乃一部英语版战争史诗”。这是国内外公认最好的《三国演义》英译本,曾多次再版,部分内容亦被选入《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》。

1999年,罗慕士又一次推出《三国演义》译本《三国:一部历史小说》,以供美国大学的文学课堂使用。这是基于1991年全译本进行删减的节译本,基本保留了小说的故事情节,但突出了小说和历史之间“天衣无缝的衔接”。译作于2014年和2020年连续再版,并入选加州大学推出的“世界文学译丛”系列。可以说,《三国演义》成就了罗慕士,罗慕士也赋予了《三国演义》精彩纷呈的异域生命。

探究汉字魅力,精准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罗慕士认为,汉字的象形特性,承载着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;而言约意丰的汉字,对翻译者、研究者都是极大挑战。他特别注重“汉字的构词方法和汉字的历史与寓意”,以及“汉字的音与意之间的联系”,甚至“将汉字的发音与隐含意义联系起来思考”。罗慕士突破了既有关于汉字仅有表意功能的研究局限,将汉语的“字形-语音-文化”进行关联剖析,在西方汉学界具有革新意义。比如,在翻译《三国演义》时,他拒绝将“义”简单固化地译为righteousness(公正),而是根据具体情境灵活选用honor(荣誉)、obligation(义务)、duty(责任)等词,以呈现儒家“义”概念中复杂的情谊纽带、伦理准则与行为规范。

退休之后,罗慕士还在钻研《道德经》,并透过文字表面,解读出字里行间的深意。对于《道德经》中的“德”,他以virtue(美德)、generosity(仁慈)、favor(德行)等多维表达,展现老子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实践。此外,他还“最大程度地接近了原文的神韵、节奏和韵律”。又如,罗慕士将“人多利器,国家滋昏”译为“The more de-vices that bring gain, the more the clan and kingdom’s bane”,用四步抑扬格来对译原文的四字句结构,且gain与bane押韵,着力再现这一中华典籍的形式之美、声音之美。

中华经典承载的不仅仅是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深邃思想,更蕴含着独具东方韵味的文化精粹、审美趣味和核心价值观。但是,他们以何种姿态走出国门,长期以来莫衷一是。深耕于中国哲学、古典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罗慕士,因课程教学之需,逐渐沉浸于中华经典殿堂,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铺就了一条新的途径。

据《学习时报》

金岳霖哲学课上讲锻炼

有一年北大开学,金岳霖上第一堂哲学课,他叫起一名学生提问。奇怪的是,他并没有问哲学问题,而是问学生现在讲台上有几个“金岳霖”。

这可把学生给问住了,怔在那里不敢说话。金岳霖笑了,对他说:“你应该说,我面前有好几个你。”

金岳霖给大家讲了件趣事:一天他在街上散步,却被路警训斥了一顿,起因是他走在路上,前面来了一辆汽车,但他并没有闪躲,就站在路中间,搞得那辆车急停刹车。

汽车司机叫来了路警,路警把金岳霖带到一边,问他为何汽车早早鸣笛,他却站在路中间不动。金岳霖对路警说:“我往哪里走呢,我眼睛高度近视,左眼700度,右眼800度,眼镜刚才也撞掉了,我看到车来了,也听到车的声音了,可我的眼前有七八台车,你让我躲哪个呢,不如就站在原地不动了。”

这一解释,把司机和路警都逗笑了。但这件事却让金岳霖有了很深的感触,只要身体健康,各个器官都没毛病,那才是真正的人生财富。

金岳霖也担心起来,自己的眼睛这样近视,如果哪天看不见了,就做不了学问,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所以,从那以后,金岳霖就特别注重用眼问题,以及锻炼问题。

首堂哲学课,金岳霖看到这名学生体胖且戴着高度近视镜,才把他叫了起来。讲完这个故事后,他也宣布了北大哲学系的一个重要决定:所有教师压缩学时,给学生减少课程压力,让大家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体育锻炼上,并说这件事对于哲学课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
同学们听后,瞬间都鼓起了掌。

程刚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汪曾祺钟情苦菜汤

汪曾祺旅居昆明的7年,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滋养期。这座边陲小城的烟火,在他笔下化作一篇篇充满生活气息的散文。其中,苦菜汤这道看似平凡的美食,承载着他半生的回忆与眷恋。

昆明的甬道街是汪曾祺常流连之处。街边有一家专卖鸡枞的小馆子,让他念念不忘。馆子门口那口热气腾腾的大锅,煮着不加盐油、仅添猪小肠同熬的苦菜汤,汤色清亮,味道苦中回甘。食客可自取大碗盛汤,分文不取,尽显昆明人的豪爽。多年后,汪曾祺仍赞叹:“汤甚美,因为加了一些洗净的小肠同煮。”

初到昆明,汪曾祺便听闻俗语“姑娘叫老太,芥菜叫苦菜”,这使他误以为昆明人口中的苦菜就是芥菜。直到晚年写《昆明的菜》时,他仍对此感到困惑,虽云南友人坚称苦菜“别是一种”,但明代兰茂《滇南本草》记载“苦菜即芥菜,性寒可清热”,这种植物学与民俗学的认知差异,成了他心中难解的谜团。实际上,昆明的苦菜是滇中特有的野菜,与江南芥菜截然不同。

在战乱年代,西南联大的穷学生们常面临生活窘迫,免费的苦菜汤配白饭,成为他们艰难时日的慰藉。多年后,汪曾祺再访昆明,却发现苦菜汤已悄然改变:汤里不再只有小肠,食客还需蘸水佐味,曾经“掰块水煮”的质朴吃法渐被取代,这让他深感怅惘。

如今,昆明街头苦菜汤依旧在瓦罐中煮着,只是那任人自取的大锅已难觅踪影,汪曾祺笔下的汽锅鸡馆也不复当年模样。但这道平民美食,如同他的文字,在岁月沉淀下愈发清简醇厚,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,让后人能借此触摸那个时代的昆明。

冯娜 张泽生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